

沿革篇

引言：在官方与民间之间——宋理宗以前的书院概述

书院发端于唐而勃兴于宋。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教育机构，书院的内涵、性质、功能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别的，不同类型的书院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不能一概而论。

作为教育场所的书院，起源于士子读书讲学、家族聚书兴教的传统，同时与官府藏书习尚、禅林风气等不无关系。它出现在唐末五代官学废弛之际，算是对国家文教衰微的一种补偿。在局部地区，甚至代替、承担了原来儒学的职能。这种新型的学校在早期名称并未统一，除称“书院”外，也有称“书堂”、“书舍”、“书馆”、“精舍”等。南唐当权者在升元四年（940）将白鹿洞学馆办成国学（国庠），这一开先例的做法，使赵宋朝廷获得了启示。在北宋初年，地方官学不振，庙学、儒学远未遍及且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地方政权接收这些或公或私的教育设施后，

呈请朝廷认可。朝廷以颁赐‘书院’匾额作为这类新型教育实体的规范名称，并通过赐经书、拨学田、任教官等手段将书院置于国家的管理、监控之下。其著名者，即有白鹿洞、岳麓等‘四大书院’的说法。那时的书院如同唐代以来的庙学一样，既建有教习儒家经典的学舍，又同时设立供祀孔子及其高弟的祠庙，构成教学、藏书、祭祀三个空间。自然地，书院就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儒学——地方官学，就像应天府书院直接被官府当作府学来办一样。

然而从庆历四年（1044）朝廷诏令地方兴学以后，州学很快就遍及全国。书院既非“古制”，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它们显然是一种不必要且重复的教育设施，或任其自行存灭，或把它改办成州学。如石鼓书院“以徙为州学而废”，原在涵晖谷书院的宣圣祠（孔庙）被迁到州学中。这种做法正如南宋洪迈认为的州学与书院“当合而为一”之意。此后至北宋沦亡，官方书院湮然无闻。

历经南宋初年的兵乱，地方儒学破败严重，作为私人讲学场所的书院又兴办起来了。如理学名士胡安国、胡宏父子创建了文定书堂（院）、碧泉书院。胡宏还曾写信给丞相秦桧，请求朝廷命地方官员兴复岳麓书院，自求为山长，领取州县监当官的廩禄。在恢复遭战乱破坏的州、县学的同时，个别地方官也重建了岳麓、石鼓等著名书院，新建了新田、长蓼等书院。这些书院都设有夫子庙（孔庙）。淳熙十五年（1188）岳麓书院已率先实行以所在地州学教授兼任山长的做法。可见其时官府仍把书院当

作州县儒学一样来办。现在看来，朱熹、陆九渊等各学派聚徒讲学，起初并未统一标榜其活动场所为“书院”，通名只是尽可能地利用现成的“书院”。这种介于官方与民间的非正式空间，来传播其学说，在这方面上以朱熹为最。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后，一再请求朝廷赐额、颁书，承认其合法地位，建议设置洞主官员，其意也是要使书院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官学，或以他倡导的教育模式来取代、改造当时存在的传统的书院和州县学。不过当时朝廷不仅置若罔闻，反而严厉打击、禁止理学家从事干预政治的活动。

程朱理学在理宗朝（1225~1264）始获得合法地位，并逐渐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朱熹生前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由于朝廷的倡导，延至宋末，书院遍布各地，在两浙东西路、江南东西路、福建路、广南东路等东南地区，基本上每个州府/军都拥有一、二或若干所官办书院，而且州以上的政区——路，州以下的政区——县，也出现好些官办书院。甚至个别镇官也创建了书院，如福建泉州的石井书院、兴化军的涵江书院。尽管朝廷没有明确诏令州县兴建书院，但地方官顺应潮流，已蔚然成风，许多书院获得皇帝的赐额肯定。这样一来，官办书院与州县学并行不悖，互相呼应，一起构成了高层次的地方儒学教育设施。

《续文献通考》对南宋后期的书院作了概述，然后归纳出书院的三大形态：1、朝廷承认的官办学校；2、纪念名贤过化的祠堂；3、士大夫讲学的处所。

实际上，后世的所谓“书院”也基本上不超出这三大形态。

一 宋元潮州的书院（公元 1243 ~ 1368 年）

书院制度在各地的普遍实施，始于南宋理宗时期（公元 1225 ~ 1264 年）朝廷大力褒奖宣讲理学的书院，地方官府遍设书院。声势所及，潮州也在淳祐三年（1243）、九年（1249）分别创办了韩山书院与元公书院两所州一级的官学：两所书院皆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知州倡议，与州学并行不悖。书院采用和州学类似的课程及考试制度，也拥有一份通常以田地形式出现的办学基金。书院主持人——山长由州学教授兼任。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潮州早期的书院，不是有南宋初年的蓝田书庄么？清代雍正、乾隆《揭阳县志》这样记载：郑国翰，字宁夫，揭阳县蓝田（地名，明清称为蓝田都）人。他与理学大师朱熹在绍兴十八年（1148）同榜考中进士，初任莆田县令，后来做到兵部郎中。他看到南渡后朝廷国事日非，于是申请告老还乡，在蓝田的飞泉岭（今在丰顺县南）下构筑书庄，聚集生徒，讲学其中。朱熹游历到揭阳，住在他家里，和他一起到蓝田书庄，书写“落汉鸣泉”四个大字，标识在亭中，又把四大字镌刻在山岭峻壁上，留下题名。因郑国翰所居住的地方名叫“澹轩”，学子称他为澹轩先生。

然而我们在宋代《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中看

到有关郑国翰的资料，却与旧志大相径庭。郑国翰在这一年考中第五甲第五十一名进士，和朱熹同榜这个没错。问题是该书记录“郑国翰，字良佐，小名佛先，小字善良，年五十……本贯潮州海阳县长乐乡尚仁里”字号、里籍都与《揭阳县志》所记不相符。而嘉靖《潮州府志》只记载郑进士建亭飞泉岭上以观览胜景，朱熹为亭题上“落汉鸣泉”字样，并不言及朱熹莅潮和书庄事。所以，有无存在聚徒讲学的书庄颇值得怀疑。即使当年筑有所谓的“蓝田书庄”，那也只能算是一个私人读书兼有讲学的处所，性质接近于唐代士人所谓“书院”的读书处所——这种性质的读书处所在宋代也有很多，尽管它们不一定称为“书庄”或“书院”。这与宋元一般意义上的书院是两码事。所以我们说将蓝田书庄视为潮州早期的书院尚乏确凿的证据。

（一）韩山书院

1. 潮州首所书院的诞生

南宋以前，潮州尚未见有书院的记载。有关书院词典和一些文章认为，潮州最古老的书院是韩山书院，始建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误会。究其根源，是作者误读了明清方志转录的过于简略且容易产生歧义的记载。我们以现在能见到的年代较早的嘉靖《广东通志初稿》（成书于1535年）嘉靖《潮州府志》（成书于1547年）的记载为例：

韩山书院：在州城南。宋元祐五年知州事王涤

始建为韩文公庙。淳熙六年，知州事丁允元迁于东山。庆元五年，知州事沈杞复建亭于旧址。淳祐三年，知州郑良臣改建为祠堂，前为讲堂，列以斋舍。元至顺间，总管王元恭改建为韩山书院。（《通志》）

韩山书院：在城西南。宋元祐五年知州王涤始建，扁曰“昌黎伯庙”。淳熙十六年，知州丁允元迁于东山。庆元五年，知州沈杞复建于旧址。淳祐三年，知州郑良臣改建祠堂、斋舍，课试诸生。元至顺间，总管王元恭改为城南书院。（《府志》）

这两段文字叙述含混不清且前后抵牾。以上记载：1 似乎告诉人们韩山书院始建于元祐五年（1090）但又指出王涤所建为韩文公昌黎伯庙，书院与纯粹的祠庙纠缠不清。2 丁允元迁址的时间一说淳熙六年，一说淳熙十六年。3 庆元五年（1199）沈杞在旧址上重建，一说是亭，另一处无表明，是书院还是庙？4 淳祐三年（1243），一说“改建为祠堂”，一说“改建祠堂、斋舍”究竟是把旧建筑物改建成祠堂，还是把祠堂改建成书院？5 更为离奇的是，一说至顺间，王元恭改建为韩山书院，另一说改为城南书院。这样一来，弄得人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幸好从《永乐大典》卷 5343“潮州府”辑录的宋元方志《三阳志》旧文可解决问题：

《图经志》韩山书院在城内西南。《三阳志》：仿四书院之创，地在州城之南，乃昌黎庙旧址也。淳熙己酉，丁侯允元迁其庙于水东之韩山，其地遂墟。（《三阳图志》以溪东之山，乃韩公登览之地，手植木在焉。昌黎手植橡木，他山所无，土人呼为韩木。庆元己未，沈侯

祀即墟创亭曰“盍簪”。淳祐癸卯 郑侯良臣以韩公有造于潮，书院独为阙典，相攸旧地而院之。外敞二门 讲堂中峙 扁曰“城南书庄”后有堂 扁曰“泰山北斗”公之祠在焉 旁立天水先生像。翼以两庑 四辟斋庐……山长、堂长位于祠堂之左右，仓廩、庖福、井厕靡不毕备。……此书院创始之规模也。

这段原始材料讲得非常清楚，韩山书院由郑良臣创建于淳祐三年（1243），它是在原韩文公（昌黎伯）庙遗址上新建的，在此之前，潮州并没有书院。曾楚楠先生在《潮州书院浅议》一文中对元祐五年创建书院这一错误说法的辨析细致入微，也认为潮州有书院，实始于南宋淳祐三年（1243）。我们认为，尽管韩山书院与韩文公祠庙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祭祀空间的祠庙是书院的主要构成部分，也能发挥重要的教育作用，但是祠庙的创建时间绝不能等同于书院创办的时间。人们所熟知的苏东坡苏轼撰写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及王涤《拙亭记》，只记述元祐五年把韩庙迁建于州城之南七里，半点不涉及书院的建置。再从当时全国大兴州、县学，书院湮然无闻的背景来看，元祐年间创办书院的说法难于成立。

简言之，潮州有书院，实始于南宋淳祐三年（1243）韩山书院的创办。不过当时书院并不在今潮子桥东韩山麓韩山师院址，也不在今城南小学址 其遗址在今潮州市南郊的蔡陇村地名“圣者亭”处。

2. 两代未造的兴废

到了咸淳五年(1269)韩山书院投入使用还不到30年基本构架已不堪负荷摇摇欲坠。当时刚好福清人林式之担任潮州通判兼代理知州事,有一次他到书院讲学与祭拜韩公目睹此种情形追念前人业绩说:“书院这样破败却没人去修葺我感到非常惭愧!”随即以匡扶文教为己任捐出俸金40两,委任书院堂长林震曾负责修复。修复工程尽管不大但正当宋末边疆军事吃紧后方盗寇扰攘地方官府应接不暇的时候,作为地方长官的林式之能关切文教实在难得。

至元十五年(1278),以马发为首留守潮州的南宋地方军事力量,与南下的元朝大军展开了殊死战斗加上地方土豪势力的争夺战潮地遍燃战火。书院的讲堂、庙宇及附近的亭台被破坏得荡然无存。这距离上一次重修的时间只有9年!

非常幸运的是才隔6年(1284),韩山书院又重建起来了并设有一名山长主持工作。一般认为这是当时广东宣慰使月的迷失和潮州路总管丁聚在潮贡献之一桩。虽然当时书院刚刚得到恢复,规模相对狭窄,配备多有缺乏,但在战乱后社会重创未愈的情况下,蒙元地方官员恢复书院规制,使潮州这一重要文教设施得以延续下来,功不可没。

至顺二年(1331)夏天潮州路总管王元恭拓展了书院的规模,并对其格局作了较大的调整。翌年,山长陈文子特请当时大儒吴澄撰写《潮州路韩山书院记》,备述扩建的缘起、经过。扩建后的书院祠

庙、讲堂、斋舍、厨房、仓库一一具备 宏伟壮观 远比以前为胜。

元末潮州政局动荡，韩山书院在至正十二年（1352）再次毁于大火 遗址披满荒草 名存实亡。至正二十五年（1365）陈友定政治集团控制了福建及潮州。次年冬 其部属西夏人王翰 那木翰 出任潮州路总管，着意恢复书院规制，他以书院原址不合礼制为由，毁掉城内西南的大隐庵，把书院迁建进来。王翰在元朝即将灭亡的前夕重建书院，这一举措在全国是相当罕见的。这件事，有泉州人刘嵩撰写的《重建韩山书院纪略》为证。

此后直至清初，韩山书院就在今城南小学址了。于是明初的《潮州府图经志》便记韩山书院“在城内西南”。我们以为，王翰把书院从城外迁入城内，除了礼制原因之外，可能是鉴于书院已正式成为元朝官学之一种 建在城内更为适宜的缘故吧。

（二）元公书院

元公书院创办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是潮州知州周梅叟为纪念其先祖——理学创始人周敦颐而创建的官办书院，遗址在今潮州市上水门内北太平路东侧一带。

北宋熙宁四年（1071）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周敦颐以广东转运使的身份巡历至潮州，留有《题大颠堂》一诗 故潮州也是这位先贤过化之地。一百七十八年后，他的后人周梅叟任职于潮，正赶上各地争

办书院，宣扬理学的大好形势，为他的先祖建祠致祭，设书院教养生徒，于公于私，应该说都是顺理成章。

书院紧靠州学的西面，割用了州学教授办公处所的一半建成的。工程由州学直学（负责管理学校钱粮的职员）许希闾主持，规模与韩山书院一样。当时创办始末，由南恩州（治在今阳江市）知州黄必昌（晋江人，号洁斋先生）撰写记文，现在碑文都看不到了。

宝祐二年（1254）前后，因书院里的祠堂太狭窄，又逼近行衙，容纳不下前来祭祀行礼的师生，知州陈炜对书院祠堂进行拓宽。对这桩事，当时州学教授吕大圭作《记》勒石壁上，可惜碑文也佚失了。

宋元之际那场空前的兵火，使潮州的庙学与韩山书院都变成一片瓦砾，惟独元公书院逃过厄运，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在元初潮州庙学尚未恢复之时，书院就暂且充当地方的庙学，承担起潮州路学的职能来。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广东道肃政廉访使张处恭巡视潮州路之后，重建了文庙与路学，书院空间便得以腾出。接着，在路总管陈祐的主持下，很快就恢复了元公书院的办学。

又过了两年，广东道儒学提举熊炎委托张圭英、石国珍两位山长负责元公书院的重建工程。修缮后的元公书院，有祠堂 5 间，讲堂 3 间，两旁分列 4 所斋舍，不仅比原来大为改观，而且比刚刚复建

的因陋就简的韩山书院要好得多。对此，姚然撰写的《重修元公书院记》中有翔实的记述。

至顺二年(1331)潮州路总管王元恭在修建韩山书院的同时，见到元公书院前面被民居挤占，污秽杂乱对圣贤有亵渎之嫌就立即进行清理用粉墙把书院围起来改造两廊装饰正堂美轮美奂。

直至明初书院尚存。《潮州府图经志》记元公书院“在太平桥东隆文坊边”，仍然是原来的院址。可是到后来，这所书院就渐渐变成单纯保留祭祀功能的祠庙了。

(三 京山书院 舍)

南宋末年潮州除了韩山、元公二所官办书院外，现在我们还知道另有一所由地方进士胡申甫创办的私立书院，叫京山书舍或京山书院。

该书院旧志缺载，仅赖林希逸《潮州海阳县京山书舍记》的记录为证，书院遗址今已不可考。按《记》文记载书院建于咸淳四年(1268)为私家独创格局严整规模浩大配置齐全丝毫不比官办书院逊色。难怪林希逸把它誉为“南州奇观”又说“京山之名媲美衡(指石鼓书院)鹿(指白鹿洞书院)”这恐怕更多是出于一种激励吧。奇怪的是像这样一所大规模的书院，方志却没能留下关于它的片言只语，就连它的创办人胡申甫，也未能在地方文献中见到其任何信息。这些问题只能留在以后再寻求解答。

（四）得全书院

始创于南宋的韩山、元公两所官办书院，进入元代后，一直都在延续运转着。到了元代后期，潮州路又多了一所官办的得全书院。

得全书院是在得全堂（祠堂）的基础上发展来的。书院遗址在今潮州市西平路南段以西。原来宋代名臣赵鼎遭秦桧迫害，在绍兴十年（1140）被贬逐，安置潮州。他在潮临时居住的屋子称为得全堂，后来为纪念其忠义气节，潮州的官员、民众在该遗址立祠祭祀。淳祐六年（1246）知州陈圭曾重修祠堂，并下拨田地租金，作为供奉香灯之用。宋朝灭亡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祠堂就渐渐荒废了。

到了元朝末年，赵鼎的六世孙赵继清来潮州当推官，把原来的得全堂扩建成正式的书院。在至正二年（1342）他请当时的大文豪欧阳玄写了《得全书院记》。记文说，赵继清请求朝廷外派他到潮州当官，其目的本来就是要恢复得全堂，弘扬他先祖的精神。于是，他到潮州不久，就拿出一笔职位津贴，在原址上将祠堂扩建成一所配备齐全的书院：有孔夫子的燕居室、供祀赵鼎的祠堂、讲堂、门楼、围墙等。赵继清希望这所书院能给聪颖好学的潮州士子提供一个读书的好去处。遗憾的是，元朝灭亡后，进入明朝，书院却得不到官方的维修与看顾，很快就荒废了。嘉靖《潮州府志》说它已荒废很久了，往后再也没有获得重建的机会。

二明代潮州的书院（公元 1368 ~ 1644 年）

明太祖时沿袭元朝典故恢复了山东曲阜孔子家乡）的洙泗、尼山两所书院，并各设山长 1 名，这是人所熟知的。个别地方如福建漳州府在洪武年间（公元 1368 ~ 1398 年）官民共同新建了芑江等 4 所书院，这也属非常特殊的例子。我们更多地看到书院消沉、荒废的种种事实。有些明代方志记载先是朝廷把全国各地书院的山长改为训导，接着又革罢训导，将书院的学生都归并到县儒学中来；又说洪武初年，书院就不再设立教官，于是书院就日渐颓废了。

在政策的干预下，明初有部分书院被改办成府（州）学、县学、社学或是归并到以上各级儒学中去；也有部分书院被地方官府保留下合乎规范的祭祀职能，而抛弃了实质性的教学活动；当然有很多书院自然荒废了。正统九年（1444）皇帝在诏书中，命把生徒学习的处所改为书院，似乎给后来书院的复兴带来一道曙光。果然正德、嘉靖年间讲学之风大兴，书院遍布全国。总之，书院允许存在但不作为独立教育实体正式纳入官学系统，一如明代人沈德符所言“本朝旧无额设明例”。

（一）明代前期（公元 1368 ~ 1505 年）

宋元以来的韩山、元公两所书院到明初尚存，

它们的田产似乎也未被接收转移。后来，这两所书院却有不同命运。

韩山书院在永乐年间得到维修，并增添地方名宦的祭祀。正统三年（1438），潮州知府王源又整修了书院前面的亭榭。我们虽然难于判断那时书院是否在开展教学活动，但可确信书院未曾荒废过，显然存在另一种意义的教育活动——祭祀仪式。天顺七年（1463）参政龚毅买地拓宽书院格局到了弘治十年（1497），潮州府同知车份购买民地扩建书院的讲堂、斋舍，增添名宦、乡贤的祭祀位。这表明至迟到这时候，韩山书院必有定期或不定期的讲学（宣讲）活动，这与正统九年（1444）以后政府重新重视书院教育功能的步调是一致的。

元公书院，也称濂溪祠（元公祠、周子祠），在正统二年（1437）和成化年间（1465~1487）分别有过两次重要的修建，仍旧祭祀宋朝周敦颐等 5 位先生，可能已没有实质的教学活动。一说到弘治六年（1493）因旧址被占用，该书院祠迁到城外三利溪亭去了。又一说在嘉靖末年，该祠被搬上金山——事实上，可是金山顶早在正统元年（1436）之前几十年已有濂溪祠（据金山石刻），莫不是两祠合为一祠？总之不管如何，嘉靖二十四年（1545）潮州知府郭春震为其书写匾额“濂溪祠”，这意味着元公书院已完全变成仅存祭祀的祠庙，于是在方志里，它不再与韩山书院并列在“学校”条目中，而是归属到“祠庙”部分去。

天顺年间（约在 1464 年或稍后），潮州知府陈

瑄、在城北金山上创建了一所新书院，称为玉华书院，可惜的是其具体情形不得而知。

（二）明代中期（公元 1506~1547 年）

无论从全国范围看，还是着眼于潮州地区，这个时期都是明代书院最具学术活力的黄金时期。正德（1506~1521）前后，白沙陈献章学说开始传入潮州，随后又风行阳明（王守仁）心学，培植了一批潮籍弟子，最终形成了一个以薛侃为代表的“潮州王门学派”，对本土的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此期间，潮州书院异彩纷呈，生机盎然。

1. 新兴的带有学派性质的山林书院或精舍

正德八至十二年（1513~1517）间，杨骥在韩江东岸创建玉林精舍（也称东津精舍），与其弟杨鸾、友人陈明德等人一同修习学问，只是当时研讨的知识是带有白沙学说色彩的。地方士子薛侃在正德九年（1514），到南京投身于王阳明门下，问学 3 年；他于正德十二年（1517）考上进士后，又追随老师到了赣州，一住也是 3 年。他对乃师的服膺及对师说恪守之深，为众人所公认。从正德十二年起至十五年（1517~1520）在薛侃的带引下，杨氏兄弟与陈明德改弦易辙，相继转奉阳明学说，笃信“合一”之旨。他们积极创办书院、精舍，宣讲讨论，不遗余力地在本土传播阳明学说。

（1）金山玉华书院（即北山精舍）是杨骥、杨鸾

兄弟与陈明德聚徒讲学的重要地方，他们彼此往来讨论，揭开了王（阳明）学占据岭东学术阵地的序幕。

(2) 中离书院 是薛侃与其弟薛侨、侄薛宗铠在桑浦山麓修辟的岩洞书院，他们每天总是和士友们讲说个不停，消息传到邻近几个省，好多志同道合的读书人遂慕名而来，简直到了容纳不下的地步，盛况空前！

(3) 南溪精舍 在县城南面 榕江水边 由揭阳县乡绅林继业创建。薛侃、杨璠等乡贤都曾在此讲学。

(4) 太极精舍：在海阳县辟望村陈明德的居处，有许多宦游至潮的名士都造庐请教于陈氏。

这些书院和精舍俨然成为当时潮州地区的学术中心。

阳明心学风行全国的结果，遂使官民合建的书院大量出现。嘉靖十年（1531）由薛侃倡议乡绅请示巡抚建宗山书院（即怀惠祠），用来祭祀阳明先生并创设讲堂、经楼、书舍作为士子讲习之所。地方官员又拨款购置院产，春秋两季还派遣有关官员主持祭祀仪式。

2. 作为儒学辅助机构的官办韩山书院

正德、嘉靖年间，韩山书院屡次得到官府的整修，又重焕生机。尤其在嘉靖七年（1528）经被贬为海阳县教谕、名臣陈察的请求，潮州两任知府相继修葺祠宇，清复被占田产，新建讲堂——“原道堂”，

广辟斋舍 聚纳众士子。这样看来 老牌的韩山书院仍是地方儒学 府、县学 的重要补充与辅助机构。

3. 以祭祀为主的祠廡 生祠 书院

弘治、正德年间，地方士民为海阳县知县金谧（弘治十八年始任 建造了义安书院 这是现在知道的潮州地区最早的一所纪念在任官员的生祠书院。建于嘉靖十二年 1533 纪念海阳教谕陈察的虞山书院虽也属生祠 然而 我们又看到 该书院不仅为供祀之地，同时又有不定形式的讲习活动，是士子们聚会勉学的好去处。正如下面所讲到的，明末清初的许多生祠书院都存在这种情况，祭祀仪式和教学活动确实难以截然分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潮州书院数目开始增加 属性渐趋复杂 地理分布也悄悄地发生变化 宋元以来官办的类似廡 州 学、县学的书院 与官民公建的生祠书院依然集中在政区的中心——府城，而迅速勃兴的学派讲学式书院则大多散布于城郊或远离城镇的山林中。

（三 明代后期 公元 1548 ~ 1644 年）

嘉靖中叶以后，讲习阳明心学的书院或精舍在本地区日渐式微。先是学派的中坚人物杨骥兄弟、陈明德、薛侃相继去世 许多读书人宦游在外 书院骤然冷清下来。还有就是这里士人的学术思想已出现分化变异，阳明心学受到批评，山林精舍也就风